

與拉洋車的同時期興旺的是北京的警察制度。警察最早是彈壓街面,幫助群眾的,大家都是街里街坊,並不會欺壓百姓。他們管拉洋車的不會太罰款,馬路邊上能設有供洋車夫喝茶的地方,會管着洋車夫不許跑得太快,以防止炸了肺跑死。因此北京街面上討生活的人,大多能彼此和諧,相互制約,不會被人追着打攔着跑。

過去的窮人也有樂呵的時候,可能是消息閉塞,不知道富裕的人怎麼活着。再起碼是“窮幫窮,富幫富”,窮苦人不會多有文化,但尚能維係着街坊鄰里的關係,好比香港的九龍城寨一樣。當然,窮苦人的生活不能美化,他們的工作沒地位沒尊嚴。人家坐着你站着,人家吃着你看着。但窮苦人想不到這麼多,先飽腹再說吧。

但不論有錢沒錢,都講禮義廉恥,都一樣喝豆汁兒。

**以善待窮人為榮,趕走窮人為耻
富貴本無種,盡從勤中來。**

人在歷史面前是渺小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北京城少有長久的富貴,也少有長久的貧瘠。所以老北京人恪守禮教,家家都有佛堂,樂善好施,以善待窮人為榮,趕走窮人為耻。

誰家對窮苦人和下人不好,誰家名兒就臭了,沒人愛搭理。民國時,我家撿了一戶逃荒要飯的人家,姓趙,乾脆就安排在家里位于北京城外窪里村的地頭兒上,翻蓋一下幾間房子,由他們來種那幾畝地為生,順手幫忙照應一下祖

墳。每年新打下糧食來,給家里送一次嘗嘗鮮兒就行了。

再有是家中上墳去時幫幫忙,從來沒什麼“收租子”之說。後來祖墳被開闢成奧林匹克公園,這戶人家八十年代尚能聯繫。

從前的老北京,是個養窮人的地方(下)

抗戰勝利後我家家道中落,而我的叔祖父仍給北平基督教青年會捐了錢,以表他的慈悲之心,至今還留有捐款的收據。

看《老北京旅行指南》一書中,也能看到北京有眾多的慈善組織,有市政公所、京師警察廳等下屬的,都由政府撥款;也有帶點宗教色彩,私人出資籌辦的。總名目有第一、二救濟院、慈善五族平民教養院、貧民教養院(分內外城)、社會救濟院、極樂萬善慈緣總會、龍泉孤兒院、廣仁堂、崇善堂等等。

冬天時,慈善機構會開辦的粥場來捨粥,捨棉衣;夏天會捨單衣。先農壇里都設有樹藝教養所,專門收無業遊民,教給他們園藝,以便日後謀生。北京有義學,有所市立平民學校,分初小和高小,也是不收一分學費。但凡人能堅持到高小畢業就能找到點工作,甚至都能去教初小了。還有為盲童設計的啓聾學校。

另有如功德林有流棲所,即窮人的收容所,也會給醫藥和服裝,但一般做不到遣送回原籍。廣渠門內有育嬰堂。還有陸地慈航會,是由

牛車拉着,發現死人就運走埋了。各處會有義診,看病抓藥都不收錢,當然也治不了什麼大病,都是開點很一般的草藥。在北新橋一帶,義診的地方在,叫“……”。

而大批富有的老字號為了博得名聲也會

大做慈善,順便也做了廣告。同仁堂藥家除了捨藥,還會在挖溝的地方夜里點上燈,以方便路人。北京飯店也經常舉辦慈善游藝會或慈善舞會,門票一元到三元。

老北京有幾位知名的慈善家。他們不僅掏錢,還做了很多實事。做過總理的熊希齡創辦了香山慈幼院,專門培養孤兒。老捨童年時上不起學,是由西四著名的劉壽綿劉善人供給他上學。西直門大街一半都是劉善人家的產業,後來他散盡了萬貫家財,帶着女兒一起出家了,成為了宗月大師。老捨先生的很多小說,都是講貧困線以下的滑稽和幽默。他筆下的窮苦人是真窮苦,但都真本分,可敬可愛。

如今,但凡讀過點書的人,已經不易理解什麼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了。我們想不到過去人能去買二手的衣服和鞋子(不知是從活人身上搶的,還是從死人身上扒的),也沒見過大街上凍餓而死,一卷蘆

席埋到義地里的“倒臥”。但從邏輯上講,總歸是有的。

北京有過很多收編窮苦人的時候。通惠河南邊有條鐵路,當年有很多鐵路沿線的外來勞工,把工棚搭建在鐵路旁邊生活,日久天長並入鐵路系統,落戶北京了。1948年前後,北京編訂戶口,有很多人寓居在某戶,新中國上戶口的時候就算是那里的人了。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果真把考試和吃飯掛鉤,一百分的人吃一百分的飯,那麼不及格的人,怎麼也得給六十分的飯吃。也許我們養不起那麼多不及格的人,也很難一時讓他們拿高分,但真把得零分的都餓死?於心何忍呢!中國走過彎路,人人都窮過,做人不能忘本,不能沒有體恤,更不能張嘴“何不食肉糜”,尤其是讀書人。(全文完) 侯磊



掌控環境

我在一個大禮堂教“機器人導論”這門課。那個能容納400人的禮堂內零零散散地坐了90個學生,而且絕大多數學生坐在比較靠後的位置。我在前幾周上課時要求他們下次聽課儘量靠前坐,但他們無動于衷。這門課每周上3次,每次50分鐘,我下課後常感到精疲力竭。

於是我帶了一卷黃色的路障警戒帶,上面印有“請勿靠近”的黑色大字。

我在課前半小時來到禮堂,用警戒帶封鎖了後半個屋子。學生們進入禮堂後,全都自動坐到了靠前的位置,而且他們更傾向於坐最前面的幾排。誰會願意坐在風險未知的警戒區域周圍呢?

那堂課,學生們坐得離我很近,我極易傳授知識並得到反饋,他們也很容易與我互動。我拉了兩周的警戒帶,當學生們習慣了新座位後,我就沒有必要再封鎖後半個屋子了。

這件事已經過去很久了,但我仍然印象深刻。我很高興自己主動掌控了物理環境,而不是僅僅依靠毅力和忍耐挨過這勞神耗力的10周。

如果你要主持一場會議,或者做一次成功的演講,那麼請認真考慮每個人的位置;如果你在開會或聽講座時感到無聊想要離開,請挪到前排位置試試。我們身處的物理位置相當重要,它對我們的感受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



格局

19世紀,美國鐵路大王范德比爾特和另一個鐵路大王古爾德在同一條鐵路運輸線上展開競爭。

一列滿載的運牛的火車車廂,古爾德收125美元,范德比爾特就收100美元;古爾德降到75美元,范德比爾特就降到50美元。

最後,范德比爾特急了,降到1美元,這下古爾德沒招了吧?范德比爾特寧願賠很多錢,也要把古爾德擠出去。

結果呢,古爾德暗中改行了,開始販牛。

這樣,范德比爾特等於是承擔着巨大的損失,在幫對手販牛賺大錢。他明白之後,氣得幾乎失去了理智。

商業競爭看起來是在一個小格局里展開的,但是競爭高手總能看到一個更大的格局。

你在小格局里拼盡全力,常常讓你在更大的格局里喪盡優勢。

大數據點餐

一家比薩店,外賣電話響了,店長拿起電話。

店長:×××比薩店。您好,請問有什麼需要我為您服務的?

顧客:你好,我想要一份比薩。

店長:請問您是陳先生嗎?

顧客:你怎么知道我姓陳?

店長:陳先生,因為我們聯機的CRM(客戶關係管理)系統對接了三大通信服務商,看到您的來電號碼,我就知道您姓陳了。

顧客:哦,我想要一個海鮮至尊比薩。

店長:陳先生,海鮮比薩不適合您,建議您另選一種。

顧客:為什麼?

店長:根據您的醫療記錄,您的尿酸值偏高,有痛風的症狀,建議您不要食用高嘌呤的食物。您可以試試我們店最經典的田園蔬菜比薩,低脂、健康,符合您現階段的飲食要求。

顧客:你怎么知道我喜歡這種?



店長:您上周在一家網上書店買了一本《低脂健康食譜》,其中就有這款比薩的菜譜。

顧客:那好吧。我要一個家庭特大號比薩,多少錢?

店長:99元。這個足夠您一家六口吃了。但您母親應該少吃,她上個月剛剛做了心臟搭橋手術,還處於恢復期。

顧客:好的,知道了。我可以刷卡嗎?

店長:抱歉,陳先生。請您付現金,因為您的信用卡已經透支了,您現在還欠銀行5000元,還不包括住房貸款利息。

顧客:那我先去附近的提款機取現金。

店長:陳先生,根據銀行記錄,您今天已經超過了日提款限額。

顧客:算了,你們直接把比薩送到我家吧,家里有現金。你們多久會送到?

店長:大約30分鐘。如果您不想等,可以自己來取。

顧客:為什麼?

店長:我這邊看到您家是在解放路東段22號,距離我們開車去只有5分鐘的路程。您名下登記有一輛車號為××××××的轎車,這輛車目前正在距離您家不到兩分鐘車程的地方。如果您等不及,可以回家拿了現金開車來店里取,這大概要10分鐘,正好是一個比薩出爐的時間。這樣,您總共只需花15至20分鐘就可以將比薩拿回家,比我們送貨上門要快。

顧客差點兒暈倒。

1978年5月25日,美國西北大學的工程學教授巴克利·克利斯收到郵政局退回的一個包裹。他請保安打開包裹,里面是一顆炸彈,當即爆炸。保安身受重傷。

此後18年,類似案件一再發生。兇手一共寄出16枚郵件炸彈,炸死3人,炸傷23人。襲擊對象主要是大學的理工科教授,所以兇手被稱為“大學炸彈客”。聯邦調查局想盡辦法查找兇手。十幾年的調查,動用了500名特工,誤抓了200多名嫌疑犯,接了2萬多通檢舉電話,花費500萬美元,仍一無所獲。此案成為FBI史上最昂貴的調查案件之一。

1995年,兇手又一次作案,這次寄出了4樣東西——兩個郵件炸彈,炸死了加州林業協會的總裁吉卜特·莫里,炸斷了耶魯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大衛·加勒特的幾根手指;一封警告信,警告1993年諾貝爾獎獲得者、遺傳學專家理查德·羅伯茨、菲利普·夏普,要求他們立刻停止基因研究;一篇長達3.5萬字的文章,並承諾如果美國主流媒體一字不改地全文刊登,他就將永久停止炸彈襲擊。FBI和美國司法部最終同意。1995年9月19日,《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表了這篇文章,題為“論工業社會及其未來”。

讀者驚訝地發現,這是一篇充滿思辨的哲學論文,作者明顯受過專業學術訓練。論文稱,工業革命將給人類帶來災難,技術使人類喪失自由,最終將導致社會的動蕩甚至毀滅,因此人們應該摧毀現代工業體系。這就是兇手襲擊大學教授的原因,因為他們推動了技術的發展。

更讓人吃驚的是,這篇論文很有說服力。許多人開始認真思考作者的觀點,主流的知識分子雜誌(比如《大西洋月刊》《紐約客》)均發表專文討論。那位被炸斷手指的教授大衛·加

卡辛斯基的人生很不尋常。他生於1942年,從小就有超人的數學天分:16歲被哈佛大學數學系錄取,20歲進入密歇根大學讀數學博士,幾個月就拿到了博士學位。指導教授說

卡辛斯基的警告

勒特承認,文章中的推斷不無道理,工業文明時代以及人類的未來,也許真的險境重重。計算機學家比爾·喬伊則說,他對文章中預言的未來深感困擾。藝術家更是深受影響,從後來許多小說和電影(如《黑客帝國》)中,都能看到這篇論文的影子。

就在論文發表後不久,聯邦調查局收到一條線索:知情人說,此文的寫作風格和論點,很像他的弟弟泰德·卡辛斯基的手筆。1996年4月3日,卡辛斯基在蒙大拿州被捕,他的小木屋里堆滿了製作炸彈的原料。至此,郵包炸彈案告破。

他的博士論文十分深奧,全美只有十幾個人能看懂。25歲時,他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聘為助理教授,是該校史上最年輕的教授。

他在伯克利待了不到兩年就辭職了,從此離群索居。他在蒙大拿州的山區蓋了間小木屋,屋里沒有電燈、電話、自來水。平日他吃自己種的菜和獵捕的動物,晚上點蠟燭看書,砍柴做飯取暖。被捕後,他拒絕律師為其辯護。1998年他被判終身監禁,不得保釋。

卡辛斯基的這篇論文值得細讀,它對人類現狀和未來的分析描述令人震撼。作者的第

一句話就是:“工業文明帶給人類的是極大的災難。”他認為,新技術的最大問題就是剝奪人類的自由。“自由與技術進步互不相容,技術越進步,自由越退。”

作者假設,人類面對高智能機器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允許機器在沒有人類監督的情況下作出所有決策,二是人類保留對於機器的控。前一種情況下,人類會淪落到完全依賴機器的地步,只能接受機器的決策。隨著社會問題越來越複雜,而機器越來越聰明,人們已不能關上機器,關上就等於自殺。第二種結果也很糟。這種情況下,一般人也許可以控制自己的私人機器,如手機、私人電腦,但大型機器系統的控制權將落入一小群精英之手。大眾成為多餘的人,成了體系無用的負擔。

退一步說,如果人工智能沒有取得成功,人的工作還是必要的,但當機器接管了大部分具有真正重要意義的工作以後,留給人類都是一些相對不那么重要的工作。

卡辛斯基的結論是:未來要麼人類無法生存,要麼個人空前地依賴大型組織,空前地“社會化”;人類的生理和心理將是被設計和改造的結果,而不是自然的產物。他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放棄科學技術,“並勇敢地承受其後果”。

這篇論文發表於20多年前。如今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都大大進步,人類對於新技術的人迷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一項新技術還在實驗室中,人們就已開始計劃如何佔領儘可能多的市場。我們不能不擔心,卡辛斯基的預言似乎正一步步變成現實。

